

庄谐新集

金克木 著

文丐生涯

“Estu verkisto!”世界语者杨景梅送我到他住的公寓房间门外时这样说，这句用世界语说的话的意思是，当一个作家吧。

当作家，就是靠卖文吃饭，谈何容易。清末民初的上海文人中有人自嘲为文丐，看来不过是开玩笑，真正穷到那样地步的只怕不多。外国有站在街头拉小提琴或奏什么乐器的，表面上似乎自得其乐，实际上是指望路上行人在他面前帽子里放下一点钱。那可以叫做艺丐吧。他的生活大约和文丐的一样难受。杨君劝我当作家，也就是文丐，本是好意，无奈我不是不当而是当不起。我有过一段文丐生涯。此时回首当年，真有啼笑皆非之感。

写点东西给人拿去使用并不难，但要靠这个得钱维持生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30年代初我到北京，头两年家里还接济，后来哥哥一死，生活来源便断绝了。幸亏有朋友介绍我到德州教了半年书，没有挨饿。这时一位朋友当报纸副刊编辑，把我的一些习作拿去发表。我一文钱稿费也没得到。我算是给朋友帮忙，为那家报馆尽义务了。我写了几首新诗寄给

《现代》杂志。发表了，可是诗没有稿费，据说是文人遣兴作诗，给钱便俗了。我从此知道，诗文不是可以和金钱交换的商品。卖文的不是作买卖，是讨饭，当文丐，凭老板赏几文是几文，不赏也没法。我这时进学校没钱，没文凭，找职业没学历，做工当兵没体力，只有手中一只笔，不当文丐又干什么。所以杨君才那样说。

不料天无绝人之路，那位编辑朋友居然说服报馆老板，让我和朋友黄力在副刊地盘上编一个文学周刊，每月四次，没稿费，给编辑费六元。黄君是大学毕业，有资格。我发表过诗文，有能力。黄君还没找到职业，他父亲继续供给生活费。他邀我同住，不要我出房钱。这六元他也不要，全归我。我们住在北京大学附近。东斋宿舍对面有一家饭铺，专做学生的生意。可以先交一元立个小折子记账，以后随时交钱，透支几顿饭也可以。我一顿吃半斤炒饼或烩饼，一小碗酸辣汤，约合一角钱不到。这样，一天两顿饭只要两毛钱。一月有六元收入，我勉强饿不死了。可是每月两三万字稿子，要分为许多篇，篇篇形式内容不一样，要求不低。写出各种各样文体，署上形形色色笔名，可不是玩的。没有外稿，有也不能用，没稿费。全靠我们两人自己一字一字写出来。开头不难。黄君有了用武之地，大展宏才，一篇又一篇。我又写又译。两人大过写作发表瘾。几期以后不行了，字数不容易凑满了。我说黄君是“江郎才尽”，他还不服，说是很

快就有杰作出来。果然，他没有食言，写出了长篇小说的开头。

黄君的小说题是《五丈原的秋风》，写诸葛亮之死。主题悲壮，文笔细腻，用诗的语言烘托出秋日荒原两军对峙的氛围，预兆悲剧即将到来。

“真不平常。”我说。他听了很得意。

连载几期之后，他愁眉苦脸了。我知道是遇上了困难，也不好问。

我们这间房的窗外，房东栽了丝瓜和扁豆。棚上的绿叶遮得室内一片清凉。黄君便取室名为瓜豆寄庐。他胖，是瓜。我瘦，是豆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这时已是秋天，开始落叶，稀疏的阳光射进室内。我望了望窗外，说：“瓜豆寄庐要改名了。”

他好像突然惊醒，开口便问：“你说，诸葛亮临死时是什么心情？”

“我怎么能知道？你打算怎么写？”

“我本来想写的是，他这位丞相的死和卧龙岗上农夫的死没什么两样。可是现在写下去就必须是英雄的死。怎么办？”

“小说中人物往往是不随作者意图发展的。”

两人都不说话了，各做各的事。到晚上，我提醒他，明天必须交卷。后天报馆工人一早来取稿。他没答复。

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一看，黄君已经出去了。桌上留下一张纸条，写的是：“对不起，你自己填空吧。”这

害得我忙了一天才补齐了稿子。

工人取稿时带来一封信，是那位编辑朋友王君写的。原来王君有妻有子，报馆给的钱太少，从下月起他辞职转业去汉口了。当然我的六元钱也告一段落了。黄君也不必为写诸葛亮的死发愁了。小说有头无尾不要紧，我的饭钱又没着落了。

更糟糕的是，黄君也要搬走了。他的父亲不让他长久闲住，逼他结婚，给他一笔钱，叫夫妇一同去日本留学。这样，我的住房也成为问题了。

绝处逢生，比我小一岁的张益珊自愿和我同住，房钱当然由他出。我不必搬家了。

一位东北朋友找我合作写一篇论世界经济与九一八的大文章。我跑了一星期北京图书馆，查抄外国杂志，拼凑出来，由他加上头尾，居然换来几十元。正当饭铺掌柜开口讨账时，我一次交他三元，对他的笑脸望也不望一眼就昂然出门。

辛辛苦苦伤脑筋的创作只值两角钱一千字，东抄西抄的论文倒值两块钱一千字，价值和价格的比例不知是怎么算的。

照这样当文丐，那几年我是活不下来的。居然活下来仍然是靠卖文，不过不是自己的文，是翻译洋人的文。洋人总比土人值钱，翻译是土洋结合，仗着洋人大名，文就比较好卖，这是我那几年文丐生涯的经验。至于怎么发现翻译的路，那就说来话长，要另起炉灶了。

1997年11月

译匠天缘

“黄金的青春与希望

今在何方？

已如吹啸着的风

风去茫茫！”

这是我第一次翻译的一首诗中的一节，是从世界语译出的，30年代初发表在北平一家报纸的副刊上。那是北师大一个学生编的周刊，当然没有稿费。以后我和黄力给另一家报纸编了几期文学周刊，只有每月六元编辑费，没有稿费。为了凑数，我从世界语译出了两篇短篇小说，《海滨别墅》和《公墓》。两位世界语者，蔡方选、张佩苍，办起了只有名义没有门面的“北平世界语书店”，出版了两小本《世汉对照小丛书》，一是蔡方选编的《会话》，一是我译的这两篇小说。我得到一部世界语译本《法老王》的上中下三大本作为报酬。这算是我的翻译学徒时代，没有拿工作换钱。

我在蔡方选那里看到一篇《世界语文学三十年》，是用世界语写的文章，介绍本世纪的世界语的翻译和创作。我借回翻译出来寄给《现代》，发表了，

第一次得到了稿费。接着又从蔡先生处借来英国人麦谦特用世界语创作的幽默小说《三英人国外旅行记》，译出来寄给《旅行杂志》，又发表了，又得到了一笔更多的稿费。这算是我学翻译“出师”了，进入译匠时期。匠，就是技术工人。我这一辈子正是教书匠兼翻译匠兼作文匠，不过大概只能评上二级，属于二流。

1931年南方江淮大水成灾。政府收银圆，禁止流通，发行纸票子“法币”，将白银存入美国换外汇，得到棉麦贷款。灾民遍地。大城市里报纸宣传捐款救灾。我写了一封信给《大公报》副刊，说我亲身经历过的淮河水灾惨状，无钱，以稿费作捐款，署名何如。刊登出来，编者徐凌霄加上题目《何如君血泪一封书》，还写了《编者按》。信不到千字，稿费最多不过一元。不知是否捐出，反正我没得到。

偶然在天津《益世报》副刊上看到一篇文，谈天文，说观星，署名“沙玄”。我写封信去，请他继续谈下去。编者马彦祥加上题目《从天上掉下来的信》，刊登出来，当然是没有稿费的。那位作者后来果然在开明书店出了书，题为《秋之星》，署名赵辜怀。

想不到从此我对天文发生了浓厚兴趣，到图书馆借书看。那时中文通俗天文书只有陈遵妫的一本。我借到了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书一看，真没想到科学家会写那么好的文章，不难懂，引人入胜。于是我照着这书和其他书上的星图夜观天象。很快就认识

了许多星座和明星。兴趣越来越大，还传染别人。朋友喻君陪我一夜一夜等着看狮子座流星雨。朋友沈仲章拿来小望远镜陪我到北海公园观星，时间长了，公园关门。我们直到第二天清早才出来，看了一夜星。他劝我翻译秦斯的书。我没把握，没胆量，没敢答应他。

我认识了读过教会中学又是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曾君。他从英译本译出苏联小说《布鲁斯基》，要我给他看中文。我对照着读了一遍，觉得这样的译文水平我也能达到。译科学书不需要文采，何况还有学物理的沈君和学英文的曾君帮忙。于是我译出了秦斯的《流转的星辰》。沈君看了看，改了几个字，托人带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请陈遵妫先生看。稿子很快转回来，有陈先生的两条口信，一是标星名的希腊字母不要译，二是快送商务印书馆，因为天文台也有人译同一本书。我仍没勇气直接寄去，把稿子寄给上海的曹未风，请他代办。他立刻去商务，可惜还是晚了。答复是已经收了别人的译稿了。他马上去中华书局，很快得到答复，出两百元收买版权。他代我做主办了手续。我第一次卖出译稿得了钱，胆子忽然大了，想以译书为业了。实际上，商务出书后，开明书店接着出版另一译本。过了两三年，中华才出版我的译本。一本通俗科学书同时有三个人译，陆续出版，可见竞争激烈，但我没注意。三本书名不同，商务出的是《闲话星空》，开明的是《宇宙之大》。译者侯硕之，后来和我

成为朋友，他译得最好。

此时我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，每月工资 40 元。我想，一年译两本这样的书就够全年天天上班的收入了，何必还要坐班？忘了求职业的艰难，想不到译书卖稿的困苦，突然从自卑变成心高气傲，立刻辞职去杭州，在西湖边上孤山一角租房住下，到浙江图书馆找到一本《通俗天文学》，一面看，一面从上海买来新的书。看完就从头译起，自命不凡，以为当上译匠生活无忧了。

书译出来，再托曹未风去卖给商务，又得一笔钱。回北京后，下决心以译通俗科学书为业。凡是我这个科学水平低下的人能看懂而且感兴趣的，我就译出来给和我同样的人看。外国有些大科学家肯写又会写这类书，内容新而深，表达浅而显。严复译的《天演论》不是赫胥黎的通俗讲演吗？沈仲章拿来秦斯的另一本书《时空旅行》，说是一个基金会在找人译，他要下来给我试试。接下去还有一本《光的世界》，不愁没原料。他在西山脚下住过，房东是一位孤身老太太，可以介绍我去住，由老人给我做饭。我照他设计的做，交卷了，他代我领来稿费。教数学的崔明奇拿来一本厚厚的英文书《大众数学》，说他可以帮助我边学边译。我的计划，半年译书，半年读书兼旅游，就要实现了，好不开心。哪知人算不如天算，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。这时是 1937 年 6 月，“七七”事变前夕。我 1928 年离开家当小学教员，到此时已有

十年了。好不容易才有了活下去的条件，哪知仍是泡影。

日本军阀的侵略炮火和炸弹粉碎了我的迷梦。从此我告别了天文，再也不能夜观天象了。

抗战时期我奔走各地谋生。在香港这样的城市里自然无法观天，即使在湘西乡下也不能夜里一个人在空地上徘徊。只有在从缅甸到印度的轮船上，过孟加拉湾时，站在甲板上望着下临大海的群星灿烂的夜空，回想恐怕再也不会有的观星之夜，怀着满腔惆怅之情了。

在印度，城市里只能见到破碎的天的空隙。在鹿野苑，是乡下，没有电灯，黑夜里毒蛇游走，豺狼嚎叫，我不敢出门。在浦那郊区，不远处有英国军队基地，又是战时，怎么能夜间到野外乱走？悬想星空，惟有叹息。

1970年前后，我在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“五七干校”劳动。白天可以仰望广阔的天空，看不见星。夜里不能独自出门，一来是夜夜有会，二来是容易引起什么嫌疑。

80年代起，城市楼房越多越高，天越来越小，星越来越少，眼睛越来越模糊。现在90年代过了一多半了。我离地下更近，离天上更远了。

从1937年起，做不成译匠，望不见星空，算来已有整整60年了。

1997年11月

学 说 话

人一出生就要学习，也就是在这世界上，宇宙中，探路，一直探到这一生的终点。

一出世就大声啼哭，这是学习呼吸新鲜空气。然后动手动脚试探活动，睁开眼看光和影，用耳朵听声音，学习分别事物，于是接触到了母亲的奶头，用口和舌试探吮吸，学会了做人要活下去的第一要义：吃。这大概是一切人共同上的第一课。

真正算得上学习的是学说话。这不仅是探路而且是走出第一步的路了。这一课好像是人人一样，其实是各个不同。学说话可以影响到人的一生。也可以说，人的一生都在学说话，学表现自己，与外界沟通，一直到不能再说话。

我现在快到不再说话的时候了，探路也快到终点了，这时才想起走过的路，想想是怎么一路探索过来的，也就是怎么学习这个世界和世上的种种人，一直到夜间仰望星空探索宇宙。想想路上的碰壁和滑坡，幻想和真实。心里想：是自己对自己说话。写下来，是对别人说话。想到自己，讲到自己，不能不从学说话讲起。

第一课的课堂是家，第一位教师是母亲，这就不是人人一样了。各人有各人的母亲。

第一个对我说话的，也就是教我说话的，尽管我记不得，也知道一定是我的母亲。可是我小时候有两个母亲，正式说是有五位母亲，我见过的只是两个。生我的是生母，还有一位嫡母，是我父亲的继室。从父亲的“神主”或说牌位上看，父亲有原配和两位继室先去世了。父亲突然去世时我名为两岁，实际只有八个月。他留下一位多病的妻子和准备继任而未能如愿的我的生母。她原来的任务是服侍那位继母，后来生了我，地位一再提高，原来的不好听的身份也就不再提了。我父亲是淮河流域的八公山下人，大概说的是家乡话，和我的三个哥哥一样。给我学说话“开蒙”的两位母亲说的话都和我父亲不同。

我出生时父亲在江西，我的生母是鄱阳湖边人，本来是一口土音土话，改学淮河流域的话。但她所服侍的人，我的嫡母是安庆人，所以她学的安徽话不地道，直到二十几岁到了淮河南岸一住二十年才改说当地话，但还有几个字音仍然只会用仿佛卷着舌头的发音，一直到75岁满了离开世界时还没有改过来。那位嫡母说的也不是纯粹安庆话，杂七杂八。回到老家后，邻居，甚至本地乡下的二嫂和三嫂都有时听不懂她的话，需要我翻译。她自己告诉我，她的母亲或是祖母或是别的什么人是广东人，说广东话，还有什么人也不是本地人，所以她的口音杂。我学说话

时当然不明白这些语言区别，只是耳朵里听惯了种种不同的音调，一点不觉得希奇，以为是平常事。一个字可以有不止一种音，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说法，我以为是当然。很晚我才知道有所谓“标准”说话，可是我口头说的话已经无法标准化，我也不想模仿标准了。

举例说，我应该叫嫡母做妈。很可能是我自己的发明创造，在前面加了一个大字，叫大妈。自己的生母也该叫妈。我想一定是她自己教我的土音土话，妈前面加的那个音很特别，我不知道汉字怎么写，也不知道汉语拼音中该用什么平常不用的字母。我的小名也是自己起的。原来大家只用一般叫小孩的叫法。到我三岁时，大侄儿生了一个小男孩，算是我的侄孙。我成了爷爷。家里人说，两个娃娃怎么分别。我便抢着说，我是老的。于是我不满三足岁便成为叔祖父，自称老了，别人也就叫我老什么，一直到我上小学才改为“小老四”，因为我有三个哥哥，另有三个姐姐不算。可是我的两个妈妈在没有外人时仍旧叫我的小名。

严格说，正式教我说话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大嫂。我不满三足岁，她给我“发蒙”，教我认字，念书，实际上是教我说话。她不是有意教，我也不是有意学，不过现在看起来，那不是教念书而是教说话。这以后八十几年我一直在学说话的路上探索，或者说是对语言有兴趣，可以说都是从学大嫂说话开始的。

关于大嫂的说话，我现在才能总结出来。她说话的特点是干净，正确，说的句子都像是写下来的。除了演讲、教课、办外交以外，我很少听到人在随便谈话时像大嫂那样说话。她不是“掉文”，是句句清楚，完整。她会写账，打算盘，但不会写信。她读的书主要是几部弹词：《天雨花》、《笔生花》、《玉钏缘》、《再生缘》、《义妖传》（《白蛇传》）等等，会唱昆曲，会吹箫，有《缀白裘》、《六也曲谱》，会下围棋，有《桃花泉》、《弈理指归》。她教我的是《三字经》。她梳头，让我看着书，她自己不看，背出两句，叫我跟着一字字念，念熟以后背给她听。过了将近三十年，我在印度乡下，佛教圣地鹿野苑，请法喜老居士教我念梵文诗时，开头他也是让我看书，他背诵，吟出一句原文，再改成散文句子，再作解说，和中国与印度古书中的注释一模一样，说出来的就是散文，吟出来的是诗。我恍然觉得和大嫂当年教《三字经》和唱念弹词给大家听完全相仿。我竟不知大嫂是从哪里学来的。她是河南人，讲的不是河南土话，是正宗的“中原音韵”吧。她 70 岁左右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，她对我诉苦，仍然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讲她的仿佛从书上学来的话。

人的一生是同外界对话的全过程。有两种表现：一是刺激——反应，仿佛是被动的，无意识的。一是观察——思考——表达，仿佛 is 主动的，有意识的。表达一是言语，二是行动，都是探索外界的反应。这

些都是需要学习的。不过大家平常注意到学习的多是表达,用有声音的言语符号,或者是有形象的文字符号,用音乐或是用图画。

我探索人生道路的有意识的学习从三岁开始。学说话的老师是从母亲到大嫂。学读书的老师是从大嫂到三哥。读书也是说话。当大嫂教我第一个字“人”和第一句话“人之初”时,我学习了读书,也学习了说话。说话的底子是我的生母打下的。当她教我叫她那个写不出来的符号时,她是教我说话和对她做思想交流。到大嫂教我时,我觉得学读书和学说话一样。怎么发展下去的,那就要“下回分解”了。

1996 年

学 读 书

教我读书识字的开蒙老师是大嫂，实际上教我读没写成文字的书的还是我的两位母亲。

大妈识字，大概不多。她手捧一本本板印的线装书看一会儿，这是极其稀罕的事。她看的书也是弹词。多半时间是半躺在床上，常要我给她捶背。或者自己坐在桌前玩骨牌，“过五关，斩六将”，看“酒、色、财、气”，一玩一上午。身体精神特别好时，她会叫我坐在她腿上，用两手拉着我的两手，轻轻慢慢一句一句说出一首儿歌。是说出或者念出，不是唱出，那不能算唱，太单调了。

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喝，下不来。叫小妞，抱猫来，叽里骨碌滚下来。”

我跟着一句一句学。什么意思，她不讲，我也不问。

妈看到大妈这样喜欢我，很高兴。在我跟着她睡的自己房间里，她也轻轻慢慢半说半唱教我。

“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。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”

她不认识字，怎么会背这首古诗？是我父亲教她

的？还是她听来自己学会的？我不知道，也没问过，只是跟着她像说话一样说会了这四句诗，也不知道这叫做诗。

大嫂教我《三字经》时，她不看着书，和大妈、妈妈一样随口念出，用同说话一样的腔调，要我跟着学。我以为书本就是这样说话的。不同的只是要同时认识代表每一个音的字。这有什么难？大嫂用手按住教的两句，只露出指缝间一个字，问是什么。我答对了。不久，她又拿出一个纸盒，里面装了许多张方块纸片，一面是楷书大字，另一面是图。这是“看图识字”，都是实物，也有动作，正好补充《三字经》所缺少的。像“人之初”的“之”字画不出来，好像是没有，也许是有字没有画，记不得了。

每天上午大嫂在房里非常仔细地做自己的美容工作，我坐在桌边读书认字，看着她对镜子一丝不苟地修理头发，还刷上一点“刨花水”，使头发光得发亮。还用小粉扑在脸上轻轻扑上点粉，再轻轻抹匀，使本来就白的脸更显得白。那时大哥还在北方，不在家里，她又不出门，打扮给谁看？是自然习惯吧？她已经满40岁了吧？她是大哥的继室，自己只生过一个女儿，七岁上死了。是不是她把小弟弟当做自己的孩子教，排除寂寞？

我把《三字经》和那些方块字都念完了。觉得大妈、妈妈、大嫂的说话都不一样，还有书上的，口头的，“小老鼠”、“黄莺儿”、“人之初”也不一样，都很自